



王府井大街



WANGFUJING
AGUAN

戏剧出版社

目 录

王府井的七百年(代序)·····	姜纬堂(1)
不灭的一团火·····	苏叔阳 苏 雷(22)
漫话东华·····	陶 正(37)
东安市场怀旧记·····	吴祖光(55)
东安·东安·····	张永和 钱祖惠(68)
商人重利亦重情·····	毕淑敏(83)
大亨得利·····	于 卓(96)
春在枝头已十分·····	梁秉堃(112)
美之涅槃·····	石 丛(126)
老字号同升和·····	杜文勇(140)
女性世界一瞥·····	筱 同(154)
嘿,斯特法内·····	沈及明(169)
拥抱明日的辉煌·····	刘朱婴(178)
珠宝大世界·····	张之路(192)
这里有一片绿洲·····	梁 倩(202)
书的圣殿·····	白仲俭(212)
东急·友谊·····	周 鲋(225)
皮货,还得数建华·····	刘成林(233)
烟雨胸襟外 风神领袖中·····	胡晓宏(246)
留影·····	钱祖惠(261)
这山不比那山高·····	常玉昆(275)
吴经理的生意经·····	张 岩(287)

王府井的七百年

姜纬堂

驰名遐迩的王府井大街，从元代至元四年（1267年）正月，元世祖忽必烈下令营建新城，因而辟出这条街道，以至于今日，已有720余年的历史。其间，伴随着时代的风雨，政局的沧桑，该街形态、功能与地位，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和衍化，可资称述者颇多。仅其名称之更易嬗替，长度之盈缩分合，便大有可讲。

元代街名辨

元世祖认为中都城（即汉、唐以来的幽州城、辽之南京城、金之中都城，在今北京城区西南部），规模制度不足以符合新朝应运肇始，因而依刘秉忠的设计，在中都城东北辟建新城，以为帝都。至元九年（1272年）又下令改中都为大都。后来便称此兴建中的新城为大都，而以原中都为大都之南城、旧城。这大都新城，便是明、清、民国以至今日北京城的基础。元大都本为中都东北之旷野，系依先行设计，然后破土兴工之法而成的规划城市。其规划之严整、规模之雄伟，曾令当时来华的欧洲旅行家马可·波罗大为称羨，详为描述于其《游记》之中，西方读者因而叹未曾有，甚至怀疑其所述并非事实。大都之南城垣在今建国门至复兴门稍南一线，北城垣在今安定门小关至德胜门外祁家豁子一线，东、西垣为今东、西二环路之建国门、复兴门迤北段。城内街道布局皆有定制，除因地形特殊而偶有斜街外，绝大多数都是横平竖直、距离匀整地呈网格状排列。今王府井大街，就是城南部中央稍东的一条重要的南北向通道。其居

于交通冲要之情形，至今无改。

元时这条处于要冲的大街以何为称，是自南而北通为一名，还是分段各有其称？由于史料不存，记载无证，对于这个问题，今已无从确悉。根据历来对元大都城坊复原的勘察与研究，仅能知道今王府井大街路西，当时自南而北分属南薰坊（之北部）、保大坊；路东，当时自南而北分属澄清坊、明照坊、仁寿坊（之南部）。依当时分坊之制，今街两侧应分属东、西相对邻之各坊。《燕都丛考》等书说今王府井大街当时只属于保大坊，自然不对。据“坊”制常规，疑今王府井大街当时未必通为一名，或分段依坊为称。明前期犹称今街南段路东之北会同馆，为“在澄清坊大街东”（见明《兵部则例》），便足以说明分段依坊为称的事实，此当为沿袭元代之遗。准此，谓元代今王府井大街乃分段依坊为称，并无通指南北全长之名，遂得有一定之依据。

按理说，元末明初人熊梦祥所著记述元大都的专书《析津志》，应对今王府井大街当时叫什么名字有所记载。可惜的是该书早已散佚，今仅能以《永乐大典》等书所载其零星佚文，汇为辑佚之本。是即在已故目录学家赵万里主持下，而由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完成，经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之《析津志辑佚》。

《析津志》佚文中，有一则说：“菜市（在）丽正门三桥、哈达门丁字街。菜市（在）和义门外。”清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成书的《光绪顺天府志·京师志·坊巷》（后经增订为《京师坊巷志稿》，以原著者朱一新的名义单独行世。以下简称《志稿》），据《永乐大典》所载《析津志》该佚文，谓今王府井大街“元名丁字街”。自此说出，后之谈王府井故实者无不奉为典据，辗转沿述，即至1991年出版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辞典·北京市》册犹然。

其实，谓元代今王府井大街名丁字街，乃属误解。

因为《析津志》之“哈达门丁字街”，实在大都城外，与在大都城之内之今王府井大街，并非一事。分析《析津志》所列三处菜市，其三

之“和义门(明初以后称西直门)外”，已明言在城外。其一之“丽正门三桥”，应即《析津志》另条佚文“丽正门(位置在今天安门稍南，为大都南垣正门)南第一桥、第二桥、第三桥”中，位于城外“金口铜闸水”上之第三桥，决不可能指城内，因丽正门内即皇城，菜市断无设于皇城内之理。为什么要把菜市设在城外？一方面是为了便于城郊菜农就近集中贸易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城市的卫生管理。此与解放后原在天桥的菜市，迁至永定门外沙子口，正属一理。《析津志》佚文所记鱼市、猪市、果市之皆在大都各城门外，也可充作旁证。无怪乎马可·波罗会对元大都市政管理之“合于卫生”，啧啧称奇。依此类推，则在“哈达门丁字街”之菜市，自然也只能是哈达门(位于今东单十字路口稍南，正名文明门，因哈达王府在门内，衍为该城门之俗称)外丁字街之菜市，此丁字街决不可能在城内。

或以独“和义门外”加“外”字，余二处菜市皆无“外”字，而证其在城内。孤立看，此或不无道理，但结合鱼市、猪市、果市之皆在城外，且丽正门北三桥已属宫禁，则此疑大可不必。即从字面，亦不难解释。只因哈达门、丽正门外二菜市坐落在有名称的处所，或距城门稍远，故赘以标志性地名(第三桥、丁字街)，藉而明其位置。而和义门外之菜市，则因距城门较近，或其地并无标志性地名可指，才特赘一“外”字。故不能用余二处未加“外”字，即证其必属城内。所谓丽正门第三桥之必在城外，亦足说明单恃“外”字为据，决难可靠。

退一步说，纵必谓“哈达门丁字街”在城内，则其亦决不会是今王府井大街，因为，既冠“哈达门”三字，其必应在哈达门附近，不会距离太远。否则，不可能以哈达门为标志。今王府井大街之南端，固在元哈达门之西，距哈达门不算太远，但此街向北远抵东四牌楼迤西，谓其必舍近求远地以哈达门为定位标志，则未免有悖事理。依就近定位的通例而论，今王府井大街当时只能据其所在之坊、所邻近之建筑、衙署，乃至近在其西之通惠河(今南河沿、北河沿大街

一线)为指称标志。这种就近指称,在《析津志》佚文中亦不乏其例。由此,益可见指丁字街为今王府井大街之元代名称,实在说不通。

考朱一新之误以今王府井大街为元代哈达门丁字街,一是由于晚清时称今东安门大街东端,与王府井大街交点之南北向段为丁字街;二是由于王府井大街“街旁有菜厂胡同,疑元旧称也”。“丁字街”三字相同,菜厂与菜市均有一“菜”字,因而与元代“哈达门丁字街”之“菜市”,拉扯到一起。实则,晚清所称之丁字街,既无任何明确的记载说其与元代的“哈达门丁字街”有关,且前此该处并无这一名称,而菜厂胡同之菜厂更与元代的菜市为风马牛。关于此菜厂胡同之来历,朱氏业于同书该胡同下注明:“《芜史》:南海子总督一员,东安门外有菜厂,其在京之外署也。掌寿鹿、獐兔、菜蔬、西瓜、果子。”正如内府衙门中掌红罗炭者而称红罗厂,此内府衙门因掌菜蔬为常,余物则依时以进,故名菜厂。显然,菜厂胡同系因明代内府机构设署于此而名,与元之菜市毫无瓜葛。这正好是对他自己在同书王府井大街下,疑菜厂胡同为元代菜市旧称的否定。

可见,今王府井大街决非元代的“哈达门丁字街”。

朱氏为王府井大街溯源的努力,值得称赞,无如其所溯类如望风扑影之瞎猜,致貽世以误说,则难免遗憾。后之论者但知援引,未加考察,误己误人,尤不足为训。

“王府”解

王府井大街一名中的“王府”,是什么王府?

有人说:“街以王府为名,……最早在这里建设王府的……是《燕京访古录》载‘隋朝燕王府,北平王罗艺的帅府’。……几十年前尚有府前影壁一座,是千年前的遗物。”

罗艺(?—627年),是隋末割据今北京地区(时称幽州)的军阀。新、旧《唐书》皆有传。当唐高祖李渊起兵称帝后,即封这位自

称幽州总管、据幽州城以抗农民起义军的罗艺为燕王，并赐姓李，宠之为皇帝同宗。等到唐室控制了大局，自然不会再任他割据一方，遂有艺之“入朝”，即到都城长安为官。表面上，唐帝一再给他加官晋爵，但他深知处境险恶，心怀忧惧，终于贞观元年起兵反唐，旋即兵败被诛。在《随唐演义》及戏曲、曲艺中，罗艺及其子罗成乃重要角色。演义家说罗艺为北平王，全是不明史实之杜撰。今北京地区之名北平，乃明初洪武年间事，非罗艺所及知。罗艺的封号，只是燕王。

当罗艺割据幽州时，其必驻守城中，婴城以抗争夺幽州之诸多军事势力，断无弃城而于当时幽州城东北郊野、今王府井大街处建王府之理。指该处为隋唐之际罗艺的王府，既无源流可考的文献记载为据，又无考古发现作实证，只不过是因王府井、帅府园之名而生的附会。

明·郑晓《今言》卷一：“景泰三年（1452年），于肃愍公（指于谦）建议立团营，……是年，团营总兵武清侯石亨，遂请改都察院改为帅府。”所谓故都察院，指元代御史台、明洪武间北平按察使司、永乐后期至正统初年的都察院署，地即今协和医院处。景泰间，改为团营之帅府，即总兵府。帅府胡同、帅府园之名，均由此起，实明中叶之事，与隋唐之际的罗艺无干。

《燕京访古录》一书，系已故北京史家张次溪早年记其师辈之说并加调查而成。其中保存了不少晚清至民国初年的情况，但在解释方面也颇有一些不根之谈。以罗艺为北平王，足见言者之历史常识，不过是从演义中来。仅此，便应对其所说加以辨析，未可盲从。况其指为罗艺府并未言根据，唯一的理由，只不过是该处旧有一座影壁。但却举不出此影壁必属罗艺故府的证据。去芜存菁，《燕京访古录》这条记载，至多也只是告诉我们该处有此制度如王府的影壁而已。依其具体座落，结合事实来分析，则此影壁当是清代怡贤亲王允祥府门前之物，绝谈不上千年。

因此，把今王府井大街的历史追溯至隋唐之际的罗艺府，并非事实，不足信据，今王府井大街的历史，只能从元初辟建大都起始；其名所指之王府，也只能是元代辟街以后才有。

北京城区街巷名的最早集录，为明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年）成书的《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》（以下简称《胡同集》）。作者张爵在该书“中城·澄清坊”下，记有“十王府”一名。今王府井大街之名，即渊源于这十王府。

所谓“十王府”，是明成祖朱棣为从南京迁都，而集全国力量大举营建北京时的产物。这次“大工”，以兴建宫殿、坛庙为中心，同时又把元大都遗留的南城垣，自今东西长安街一线，南移至今前三门一线，从而改变了元代今王府井大街南端直抵大都南城垣的原状。另外，又在今王府井大街路东，帅府园胡同迤北，金鱼胡同迤南，校尉胡同迤西，兴建了开门于今帅府园胡同路北的十王府。

对于这十王府，自清初朱彝尊《日下旧闻》而下之论者无不说它有八千三百五十间房。这其实是对《明太宗实录》的误解。该书卷二三二于永乐十八年末载：“初，营建北京，凡庙、社、郊祀坛场、宫殿、门阙，规制悉如南京，而高敞过之。复于皇城东南建皇太孙宫、东安门外建十王邸。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。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，至是成。”细读原文，知所谓“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”，乃是“通”计，即全部工程之总计，其中既包括十王邸（府），也包括皇太孙宫，还包括皇宫、坛庙。论者不察，只截取“东安门外十王邸，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”而为言，全部工程之总计，遂尽指“十王邸”（府）一处。如此断章取义，自然不确。试想：在上述十王府四至范围内，既得使府中布局依制多有空间、通道、花园，且都是高大的平房式殿堂，又如何摆布得开这八千余间房屋？今日故宫，虽历经明清两代近五百年间之充实、整修，亦不过九千余间房屋。与相比较，益可见十王府有八千余间房之无稽。

关于这十王府的性质与用途，历来罕有解释。近年来则有人解

说为“十座王府”、“十个王府”，甚至说是“为镇守各地的亲王中年岁较长、威望较高的秦、晋等十王”建造的。其实，这些说法都是望文生义的误解。

明朝定制：亲王皆就藩于外省，各于其封地建王府，以成环拱中央之势。明成祖从燕王起家，鉴于自己以强藩而恃武力夺得帝位的教训，特别注意削抑王权，规定亲王“之国”就藩后，非经皇帝特许，不得入京，此在明太祖朱元璋时已然，至成祖而更制度化。后更发展为亲王欲出所居之城，均须奏请朝廷批准，几同被囚于其封国之中。因而永乐以后，亲王“来朝”之例甚罕。此应注意者一。当永乐十八年，北京这座十王府落成时，在位之继袭秦王尚未成年，并于永乐二十二年“未娶而薨”（死亡），而晋王则早于永乐十二年被削黜，王位虚空，尚未准其后人承袭，见《明史·诸王世表一》。此应注意者二。据此二点，便足以说明所谓“为……年岁较长、威望较高的秦、晋等十王”建造“十个王府”之纯属想当然。

实则，十王府一名乃出故典。《旧唐书》卷一百七《凉王璿传》：“先天（712—713年）之后，皇子幼则居内（指皇宫），东封年（开元十三年，725年）以渐成长，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，同为大宅，分院居，为十王宅。令中官押之，于夹城中起居，每日家令进膳。又引同学工书之人入教，谓之侍读。十王，谓庆、忠、棣、鄂、荣、光、仪、颖、永、延、济，盖举全数。……天宝中，诸孙成长，又于十宅外置百孙院。”此十王宅、百孙院，均在唐长安城之东北角，系皇城之外，见清·徐松《唐两京城坊考》。明成祖于北京皇城外建十王府，于宫城外建皇太孙宫，即远师唐长安城之布局。从知，北京的所谓十王府，决非“十座王府”或“十个王府”，也非供已“之国”藩王“来朝”居停之所，而是用为年“渐成长”，已封王但尚未“之国”就藩的皇子之居所。其形式，则是“同为大宅，分院居”，即在同一大府中，分为若干院落以居之。所谓“十”，犹如百孙院之“百”，只不过是“举（其）全数”，与习所谓十锦、十样、百姓、百家之非必指十指百相同，仅喻其

多而已。其意，实与“诸”字相同，故十王府应即诸王馆。今传《胡同集》，于“澄清坊”下并列十王府与诸王馆，后世致目为二，此实不足信。《胡同集》中之“诸王馆”三字，应为附加于“十王府”下之注释性文字，在辗转传抄过程中，始变为与“十王府”并列之名。

考创建十王府时，尚未“之国”之皇子，惟赵王一人。此十王府，应即其在北京之居所。惟成祖之营建，实出于“为子孙经久计”，故时止赵王一人，仍建院落众多之十王府，以备将来。论者不明“十王”之本意，见成祖仅三子无以当十个之十，遂上推至成祖之兄弟。惟朱元璋生子二十四人，当营建北京时此辈亲王又不止十人，遂又别生“年岁较长、威望较高”之说以为弥缝，致误而又误，益难得其解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唯朱启钤遗作《王府井大街之今昔》溯及唐长安、宋汴梁之制，可谓独具只眼。惜其只举清·顾炎武《历代宅京记》所引唐长安之“五王宅”（误“宅”为“府”），而忽略同书卷的已引之“十王宅”，致相差一间，犹未中的。朱氏之说，理应引起谈王府井故实者之重视，据而稽索。惟原文只一语带过，未加强调，致后此仍时见所谓“十座王府”之类的误说。

明确“十王府”之本义，并非徒事考据，实关乎王府井大街之史事。既知其为未“之国”亲王之所居，则明万历年间因其久赖在京师、致酿成所谓“妖书”案特大风波之福王、未即帝位前之信王（后来的崇祯帝）等之皆居于十王府，其言动之为今王府井大街历史上的故实，亦因而可得依据，足资称述。不考明“十王府”，又何从言之？

明人陆粲《说听》载一故事，说：“太监谷大用迎驾承天时，所至暴横，官员接见，多遭挞辱，虽方面亦有不免者。然欲挞辱，必先问曰：‘纱帽那里来的？’湖广某县令闻之，略不为意，云：‘到我，必不受辱。’及大用过其地，某入见。大用仍喝问云云，某答言：‘老公公，知县纱帽在十王府前三钱五分银子买来的。’大用一笑，竟无所加

也。”这说明，最迟至“谷大用迎驾承天”，即赴湖广承天府（今湖北安陆）迎请兴献王世子、后来的明世宗入京继承皇位的正德十六年（1521年），十王府即被用为地名。较《胡同集》所记又早40年。

但用十王府为地名，也不会始于永乐年间。从一个建筑物的落成，到它被用以指称所在的街巷，再到这种指称被约定俗成地公认和通行，其间应有一个发展过程。故一些书说自永乐十六年起，或自永乐年间起，今王府井大街即以十王府为名，必非事实。至于未建十王府前之明初，虽建十王府但尚未以之名街之前，今王府井大街恐仍依元旧，分段依坊为称。明《兵部则例》：“北会同馆：在澄清坊大街东。”所谓“北会同馆”，或称会同北馆，为接待外藩使节之所。其址，在今王府井大街南段路东，今帅府园胡同迤南。据《胡同集》所述，明代今灯市口大街迤南属澄清坊，迤北属明照坊，准今街南段时称澄清坊大街之例，则今街北段当时应称明照坊大街。因此，一些书上说今街“明代称十王府”，显然是以后掩前，忽略了以十王府名街之前的事实，并非确论。

至于以十王府为街名后，此名究系仅指十王府附近的今王府井大街南段，还是通指自南至北之全街，目前尚无从断定。由于张爵仅将十王府依其座落列于澄清坊下，而明代今王府井大街又非仅限于该坊之范围，且《胡同集》所记各有关坊下，又有一些街巷名，至今无法落实复原，即与今之街巷对不上号，故很难肯定十王府作为街名，必指之全街。明此，则可知一些书之径谓今王府井大街“明称十王府”，亦未免武断。

王府大街话短长

王府大街一名，在清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重定八旗居住界址时，已载于记录，见《八旗通志》、《大清会典》诸书。街加“大”字，自然是因其所具宽度和位居冲要而起；街名“王府”，自然是从明代的

十王府过渡而来。

在十王府后加“街”字，而称之为曰十王府街，见成书于明崇祯年间的《酌中志》（又名《芜史》，或《明宫史》，刘若愚著），所记为万历以来之情况。蒋一葵著于万历后期的《长安客话》和孙国敕著于崇祯年间的《燕都游览志》，则又称之为王府街。从此可知，定赘“街”字，至晚明时已然。惟或省“十”字，或不省，而呈十王府街与王府街混称通用之势。据称“灯市在王府街东”，似当时今王府井大街已全段通为一名。

由王府街至王府大街，其实只是加一“大”字。此名当然不是雍正年间始有，凉清初顺治、康熙年间已然。旧仅依《日下旧闻考》而谓王府大街一名“始于乾隆年间”，不确。尽管自清初以来，即以王府大街通称今王府井大街全段，但仍有不加“大”字仅称之为王府街者，但这只是简称、俗称。《志稿》之既记录正名，而于叙述中又用其简称，便是明例。

清初而后，虽以王府大街通称今王府井大街全段，但当时的王府大街并不等于今王府井大街，而是远较今王府井大街为长。

先说清代王府大街的北口。

清·吴长元《宸垣识略》（成书于乾隆五十三年，1788年）卷六于“大佛寺”后，特别强调：“王府街自此迤西转北，呼安定门大街。”当时所称之大佛寺，即今美术馆后街最南之东西向段，因大佛寺在其路北而名。据吴氏所说，知当时王府大街之北口，实在此大佛寺（街）之东口，也就是说今美术馆东街乃当时王府大街之最北段，王府大街的北口即今美术馆东街之北口。

此究为沿承明代旧制，还是入清后所改，今固难明，但其系清前期的事实则无可疑。惜既往论者多忽略此点，误以为当时王府大街北口即在今东四西大街西口处。个别论者虽注意到北口的问题，但却说：“这条街的长度，一直延伸到十锦（今什锦）花园胡同西口。”依所说，则今大佛寺东街之南北向段，便成了王府大街之最北

段。此虽系据《宸垣识略》附图而言，但却不足信。《宸垣识略》附图，固将今大佛寺东街与今王府井大街，皆以同一重墨粗线表示，但今大佛寺东街与其南之今美术馆东街宽窄大异，并非对接。在北者，仅及在南者宽度之半，不独今状如此，《乾隆京城全图》（绘成于乾隆十五年，1750年）所绘亦然，知清初便已这样。相差既如此悬殊，焉可视为一街？因此，在《宸垣识略》乃至他书未具指今大佛寺东街为当时之王府大街，《宸垣识略》附图乃至他图未将“王府大街”四字中之哪怕一字，标注于今大佛寺东街的情况下，恐不应无视地形之实际，轻率地将今大佛寺东街断为当时之王府大街。当时王府大街之北口，应以至今大佛寺东街南口为是。

再说王府大街的南口。

此尤为历来论者所忽略，率以为当时王府大街之南口迄于东长安街。事实不然，当时的王府大街其实已跨过东长安街，南延至东江米巷（今东交民巷）。也就是说，今台基厂大街之东交民巷迤北段，当时亦属于王府大街。

日本人编绘的《唐土名胜图会》卷三《正蓝旗居址之图》，明标“王府大街”的字于今台基厂大街之东交民巷迤北段，便是最好的图证。该书成于日本文化二年，相当于我国清嘉庆七年（1802年）。其所载北京地图，系据《宸垣识略》附图所改绘。考《宸垣识略》图，王府大街亦以重墨粗线直伸至东江米巷，足证日人改绘之有据。此外，清·昭槁《嘯亭续录》卷的“京师王公府第”条，亦明确指东长安街南今台基厂大街之大段为王府大街。《嘯亭续录》著于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六年（1817—1826年）间，所记不仅可以证明日人图、《宸垣识略》图所标之非虚，且能说明迟至道光年间，今台基厂大街中，东交民巷迤北之大段犹称王府大街。究其始，据《宸垣识略》图已如此，则王府大街之跨过东长安街，最晚到乾隆后期已然。

计其时之王府大街，南起今东交民巷，北抵今大佛寺东街南口，通长2600余米，不仅是今王府井大街历史上最长的时期，更是

当时北京城中最长的一条街。

当然，东长安街迤南的王府大街，系因清初之安亲王府、裕亲王府等王公府邸座落于该街而名；东长安街迤北的王府大街，则由明代的十王府衍化而来；二者之得名缘由并不相同。但东长安街迤北，入清后则有豫亲王府（今协和医院处）、怡亲王府（明十王府处，建怡亲王府前之利用情况不明，有人说是平西王吴三桂府，不可信）等王公府邸，时人亦无妨据而视为街名“王府”之所指。

至《志稿》，则将此街一分为二，名东长安街迤南者为台基厂，北者为王府大街，与《乾隆京城全图》所标无异。至于何时恢复旧制，今无可考，疑为咸丰、同治年间事。或本无改、复，只是东长安街迤南，时人或缘旧而称台基厂，或缘时有清代王府而名王府大街，二名通称混用，亦未可知。但其确有王府大街之名，则属肯定之事实。

值得注意的倒是朱一新在《志稿》中的一段解释。其于引《啸亭续录》后，说：“台基厂本王府街，明中叶后置厂于此，故名。《续录》所称，从其朔也。”朔，即“始”。朱氏之意有二：一是根本否认清代曾称台基厂（街）为王府大街；二是说明代前期台基厂（街）称王府街，昭梈所说的“王府大街”，只是引古溯源，用其旧名而已。依其所言，则王府大街之跨过东长安街而南，明前期已然。此实为并无根据的想当然。明代北京街巷名，惟有张爵《胡同集》为据。该书并无此说，生当三百余年后的朱氏怎会知道其“本（名）王府街”，况昭梈所记为清代王公府邸座落，又何必托古以“从其朔”，《续录》该条所记其余王公府第所在之街巷皆用时名，何独于此远引连张爵皆所未记的所谓“本名”，以指当时？朱氏之说，显然欠通。故由日本人图、《宸垣识略》图所证明的今台基厂大街之大部，清代曾称王府大街，决非朱氏如此数语便可抹杀。但其记光绪初名台基厂，则系实录。

王府井何处寻？

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“推行警政”，“整理地面”，对京师部分街巷名称重加厘定时，改王府大街为王府井大街。这是王府井被正式定为街名之始，算来已有80余载。论者或谓王府井大街之名迟至1914年，又或谓1915年才有；谓今街“清代更名王府井大街”，一若清初已然。或失之迟，或失之早，皆不足信。

何以称为王府井大街？

对此，曾有过两种解释。一是认为王府井乃王福晋之化。福晋，为满语王后之汉字译音。谓居此之某王福晋为行人事耸动邻里，致用以指称该街。说得煞有介事，其实是连明代十王府皆不知的杜撰，故极少有人相信。二是另从“井”字入手，谓街因该井而名。

但对该井在哪里，则又异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或说是大甜水井胡同之井，或说是小甜水井胡同之井，或说该井在“人民日报社(即今机械周报社)前面”，或论“在今工艺美术服务部对面的便道上”。这些说法，都似是而非。谓其“是”，是因为它正确指明了王府井大街一名，与街内之水井有关；谓其“非”，是因为那口著名的水井，并不在所说诸地方。

那口著名的水井在哪里呢？

正确的答案是：在今王府井大街南段路西，具体说就是东安市场靠北的西门对面便道边稍北，约当今益民食品店门前。

《乾隆京城全图》绘该井之位置甚明。该图以“○”表示水井。据图，该井北紧邻一组凸出街心的建筑。图上虽未标出此建筑之名称与功用，但据其独能占据官街而居冲要位置，不难知其必关乎治安与公用，疑即为治安而设的“堆拨”警铺之类，或竟与管理该井(即所谓“水窝子”)不无牵涉。图绘今王府井大街从南到北，只此一井在街上，余均在街两侧胡同内或院落内。故可断定号为王府井之

井，必指此凸向街心、全街唯一之井。

至于大甜水井胡同之井，《乾隆京城全图》则标于该胡同东首，时该胡同并不东通大街。而小甜水井胡同，《乾隆京城全图》则未标其有井。显见此以井为名之二胡同，必与王府井大街因以得名之井无关。

明·刘若愚《酌中志》“天师庵草场”条载：草场“墙外有井，甘冽可用，不减十王府街之井也。”据知：一、这口王府井，亦必是“甘冽可用”的甜水井；二、这口王府井，至迟在晚明时便已相当著名，致他处之需与相比较而为说明；三、这口王府井，恐非晚明始有，其历史或更为久远；四、当明末时尚只称之为“十王府街之井”，则简称曰“王府井”，必是清代之事。

由于这口王府井，自晚明以来便著名于市井，故民间之用以指称其所在之街，亦属恒情。今虽不明俗称该井所在街为“王府井”之始，但最迟至晚清时已然。据以估计为清中叶，恐无大误。一些记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“庚子之变”的时人日记中，即以王府井称街，足以说明当时这种俗称已甚通行。后来之定为街名的官称，只不过是从此俗罢了。

据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《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》，当时这口“王府井”尚在。且其旁标有自来水，当系清末敷设自来水管道时的产物。图中，以“○”表示自来水，以“#”表示水井。依图，今王府井大街自南至北，街边仍只此一井，与乾隆时无异。至于新兴的自来水，全街则共有七处。今工艺美术服务部对面便道上稍南，有一自来水；今机械日报社门前，则连自来水也没有。而大甜水井胡同东首之井，则已无存，与《志稿》记当时该胡同无井相符，估计该井最迟至光绪初年便已涸废。图标小甜水井胡同西口有井，《志稿》记该胡同“#一”，当即指此，但该井非《乾隆京城全图》所有，知其必凿于乾隆十五年以后。由此益可证明王府井大街之得名，全与大、小甜水井胡同之井无干。

朱一新于“王府大街”下，漏记这口凸出街心、全街惟一有乾隆间及民国初年图可证其确有的王府井，而该井又因位居冲途，影响交通，而于二十年代末展修原马路时被废除，徒存于街名中，载在众口。《志稿》既共载于前，实物又消失于后，及见者复以人所尽知而未特别加以记录，晚近论者之误指，也就无足为怪了。

盈缩分合之始末

清末更名以至后世相沿之王府井大街，并不等于《八旗通志图》（成于乾隆四年，1739年）、《乾隆京城全图》乃至《志稿》所记的王府大街。具体说，就是二者之长度不等。

首先是南口北缩

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签订《辛丑和约》，规定特辟“国中之国”的东交民巷“使馆界”。东长安街路北原向南突出的街道及建筑，需相应拆除，以符列强关于中国居民区与“使馆界”之间应留有开阔地，以保证“使馆界”安全的要求。因此，王府大街南口迤西的临街建筑，迤东之东单头条胡同路南的建筑，皆由清政府下令拆除。于是，原东单头条胡同路北的建筑，便裸露于东长安街上，成为东长安街之路北，该胡同相应废除。今只有东单二条、三条胡同，独无头条胡同，即由此而来。而王府大街之南口，亦因而北缩至原东单二条胡同西口处，短了一段。

其次是北口南缩

据民国五年（1916年）《京都市内外城地图》以及前此之图，犹以王府井大街北抵今大佛寺东街南口，而民国八年（1919年）的